

国际事务概览

1954年

科拉尔·贝尔 著
〔英〕 F·C·贝纳姆 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国际事务概览

1954年

科拉尔·贝尔 著
〔英〕 F. C. 贝纳姆 编

云 汀 吴元坎 译
董湘君 陈 漪

上海译文出版社

目 限 表

CORAL BELL
(F. C. BENHAM, EDIT.)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5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57

根据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 1957 年版译出

国际事务概览, 1954 年

[英] 科拉尔·贝尔著

F·C·贝纳姆编

云汀 吴元坎 董湘君 陈 满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东方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5 插页 2 字数 334,000

1984 年 10 月第 1 版 198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300 册

书号: 3188-52 定价: 1.95 元

内 部 发 行

D819
2.54

265535

出版说明

《国际事务概览》是一套规模较大的现代国际关系史丛书，由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主持编纂，阿诺德·托因比等英美历史学家执笔，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从1924年至1977年，共出书四十六卷，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限，分战前（1920—1938年）、战时（1939—1946年）和战后（1947—1963年）三编，论述了巴黎和会以后近半个世纪的国际关系。这套丛书的特点是引用大量政府文件、会议记录和档案材料以及许多有代表性的专著，可供我国世界史研究工作者、外事工作者、大专院校师生和其他有关人员参考使用。

这套丛书的战时编十一卷，自1978年起由我社陆续组织翻译出版，并为适应历史研究工作的需要，单独作为一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丛书》发行。为加强战后国际关系的研究，现继续翻译出版《国际事务概览》战后编。战后编共十二卷，自1947年至1963年，每年一卷或两年一卷。1963年以后则因国际关系发生深刻变化，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决定停止编写这套丛书。现有战后编各卷，大体上以时间为经，以地区为纬，论述当时国际上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重大事件。主要编写人有彼得·卡尔沃科雷西、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和唐纳德·瓦特等。战后

编各卷综述的国际事务比较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也作了一定程度的分析，但由于作者的资产阶级立场，对有些问题作出了不正确的判断，甚至污蔑马克思主义，敌视和攻击民族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凡此种种，希望读者注意分析批判。在个别地方，翻译时已作了删节，特此说明。

如引用本书，务请核对原文，并注明原著版本。

EQ 12/25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编 亚洲危机	15
第一章 印度支那的军事形势	17
第二章 关于干涉的谈判	30
第三章 日内瓦会议	60
第四章 东南亚条约组织	99
第五章 日内瓦会议以后的印度支那	111
第二编 军备	127
第一章 原子武器和战略	129
第二章 裁军谈判	165
第三编 西方和德国	173
第一章 概况	175
第二章 柏林会议	178
第三章 欧洲防务集团的收场	187
第四章 西欧联盟	194

第四编 苏联和东欧..... 203

第一章 集体领导..... 205

第二章 对外政策..... 214

第三章 卫星国的新方针..... 226

第五编 地中海..... 231

第一章 的里雅斯特和巴尔干同盟..... 233

第二章 塞浦路斯..... 242

第六编 中东和北非..... 259

第一章 埃及..... 261

第一节 革命指导委员会的命运..... 261

第二节 苏伊士运河协定..... 270

第三节 苏丹..... 280

第二章 北层联盟..... 284

第三章 以色列及其邻国..... 300

第四章 波斯石油..... 310

第五章 马格里布..... 320

第七编 远东..... F.C. 琼斯 331

第一章 中国..... 333

第一节 威望与人口..... 333

第二节	苏联及其在亚洲的平等伙伴——中国·····	336
第三节	中国、印度和西藏·····	344
第四节	中英关系·····	348
第五节	中国、美国和台湾·····	352
第二章	日本·····	358
第一节	“祥龙丸”事件·····	358
第二节	共同安全协定·····	362
第三节	日本和英联邦·····	366
第四节	赔偿问题·····	368
第五节	同苏联和共产党中国的关系·····	372
第六节	吉田内阁的垮台·····	375
第三章	朝鲜·····	380
第一节	日内瓦的僵局·····	380
第二节	李承晚总统在华盛顿·····	388
第三节	撤军·····	391
 第八编	 东南亚·····	 395
第一章	中立主义的政治·····	397
第二章	暹罗·····	406
第三章	缅甸·····	416
第四章	马来亚·····	427
第五章	印度尼西亚·····	438
第六章	菲律宾·····	444
 索引	 ·····	 451

导 言

1

现在回想起来,1954年仿佛是来了个急转弯。这是个危险的转弯,杜勒斯先生后来说过:年初头几个月中的印度支那和年终的福摩萨^①问题都曾把世界引向战争的边缘。1955年的最初几个星期受到福摩萨危机的影响,接着形势就以一种与众不同的状态安定下来了。然而1955年在日内瓦所庆祝的缓和却是肇始于1954年,因为共产党和西方世界在印度支那所进行的大规模战争终止了,争夺德国的另一个回合结束了,而且在军事方面也有了演变,这种演变应被视为战争与政治之间关系的一个新阶段的基础。

1954年这一年的外交争端的主要中心是太平洋。构成争端的紧张局势是新中国与世界各地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的产物:焦点是印度支那和福摩萨。在欧洲,出现了取代拟议的欧洲防务集团的西欧联盟,这就解决了西方阵营组织上的危机。巴尔干联盟、巴格达条约和东南亚国家条约组织的发轫,在共产主义世界广袤的南端——从保加利亚到越南——建起了一道前哨线,或者至少可以说划出了一条边界线。人们可以把它称之为由北约防线延伸而成的绊索,于是北约本身看来不也就更象是绊索而不象是防线了吗。在地中海和中东,三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的里雅斯特、苏伊士基地和波斯石油——都得到了解决,可是阿尔及利亚和塞浦路斯的局势恶化了,引起了新的争端。那些不结盟的国家看来已象一股更难应付的力量,因为它们对日

^① 即我国台湾省。——译者

内瓦会议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还有对万隆会议所采取的初步筹备工作。

在这外交活动十分频繁的一年里，最有趣的事件莫过于环绕法国和越盟之间斗争的那些行动了。围攻奠边府之役成功地瓦解了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军事力量，还为西方国家突然带来了一个关于干涉问题的危机，这个危机在日内瓦会议开幕前夕达到了最尖锐的阶段。干涉最终被拒绝了，然而英国、法国和美国未能消除它们之间的意见分歧，这就给日内瓦会议造成了一个颇难消除的对立局面。此种冲突在越南分治以后通过一项折衷办法而获得解决，即既考虑到美国正在变化中的那个对必要的
2 和可能的东南亚防务的概念，也注意了英国对亚洲国家(特别是印度)所感到的关切，以及来自小国的压力。这一妥协是通过马尼拉条约和东南亚条约组织体现的。西方国家在日内瓦削减了它们在印度支那的损耗，在马尼拉重新确定了它们在东南亚的防线。它们承担的义务中有一项(不太明确的)是协助东南亚有关国家保持内部安定，因为这些国家里的政治平衡已成为影响世界均势的一个因素。

这个事件涉及面颇广，影响也很大。人们首先可以把它看作是冷战在演变为阵地战之前的那个军事阶段的最后一次闪光，是法兰西帝国在亚洲的末日，或是英美在东亚政策上危险而尚未弥合的裂缝的反映。对印度支那人说来，这意味着产生了四个新的小国；对西方来说，这是欧洲霸权开始撤退的里程碑。它为共产主义世界提供了从1949年以来在领土上得到的最实质性的收获；它也使西方看到了生动的技巧表演，即那种自我标榜的亚洲民族主义(即使受到很不高明的操纵)，也能转而为共产主义服务。人们可以把它看作是胡志明作为共产主义者的胜利，或作为民族主义者最严重的失败。

然而总的说来，这一事件最重要的方面可能还是因为它标志着中国作为强国出现在世界外交舞台上，中国由于战争而参加1943年开罗会议是这一事件的前提。稍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两次会议之间，英美两国的主次地位颠倒过来了。罗斯福总统为旧中国谋求的国际地位在一次会议上给予了新中国，美国以勉强和不信任的态度参加了这次会议，英国则在该会议上充当了美国及其地位已发生变化的前保护国之间的居间人。

中国在当时那些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杜勒斯先生在他“战争边缘”的谈话中所提到的三次事件都是同中国的冲突事件)主要是说明了另一个也许是更卓越的大国的出现，而不仅仅在于获得参加国际会议的资格，这对其他大国来说是有威胁的。就在那一年，苏联对中国也表现了十分明显的尊重，这对那些与该国结盟的国家来说也许是一个可资依据的准则。在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先生在系统地阐述政策方面一点也不比莫洛托夫先生差——这次会议中最重要的一次会晤也许是莫洛托夫先生在休会期间回苏联去后孟戴斯-弗朗斯先生和周恩来先生的那次私人会见——同时还有例如包括布尔加宁元帅和赫鲁晓夫先生在内的共产主义世界大部分高级领袖对北京的访问，有关移交旅顺港及俄国在中苏联合公司中的股份等的谈判，都说明了这个问题。

中国政府1953年普查后公布全国人口为六亿，对这样一个邻国表示尊重，当然是睦邻之道。光是人口并不能使一个国家令人可畏，然而如此多的人民，如果革命成熟，甚至工业化计划只要部分得到实现，最终也能使中国强大得足以使世界均势完全改观。而在1954年更清楚地展示出来的则是周恩来先生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成功地访问了印度和缅甸，证明中国在亚洲的作用增强了，而且强烈地吸引了许多不结盟的亚洲人。

的确，在 1954 年，周先生在外交方面的表现是相当出色的。越南的危险局势稳定下来了，该国北半部通过从属性的联盟得到保证，而这种联盟在很多方面对中国是有利的。中国同印度就西藏问题签订的协定满足了中国的所有要求，而中国只对印度的利益作了极小的让步，但是这对中印关系并未产生明显的损害，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声明也是十分投合亚洲人的感情的。欧洲大国在日内瓦会议上默认了这一事实：东亚事务的处理不能把中国排除在外，而它的俄国盟国又曾表示不能把中国视作卫星国。中国将成为万隆会议的主要人物。总之，中国正在稳步上升为一个大国，在外交上只与共产主义集团往来的孤立状态也正在很快地消失，甚至艾德礼的访问也可视为摆脱孤立的有启发的迹象。

诚然，就中美关系恶化而言，这一年各个时期中国外交成就所取得的补偿似乎不大，因为几乎要发生战争。不过这一年由于美国各派意见分歧，所以它的太平洋政策的总趋向实际上还是比较谨慎的。有人认为（这种观点起源于美国，但在欧洲十分流行）它的政策就是在主张发动预防性战争和主张和平的两派压力下左右摇摆，最后由艾森豪威尔总统亲自作出倾向后者的戏剧性决定。9 月 12 日在丹佛举行的特别国家安全会议是一个转折点，会上宣布总统否决了在金门受到攻击时即轰炸中国交通线的建议。^① 一个月以前，在 8 月 11 日，总统曾说，在核武器时代，预防性战争是“不可想象的”；他甚至拒绝认真听取任何人在这个问题上所作的陈述。^② 如果美国有一股思潮认为时间对中国有利，不如立刻同它发生决定性冲突，那么这种思潮的若干

① 《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 1954 年 11 月 9 日, 转引《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 11 月 8 日。

② 《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 1954 年 8 月 12 日。

代言人虽有影响，似亦未能使他们的主张受到所想象的那样重视。关于莫边府的问题显示出国会对于同中国作战缺乏热情，预防性战争的竭力鼓吹者李承晚先生在7月间的两院联席会议上慷慨陈词后，全场令人难堪的静默，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11月份中期选举后，民主党又在国会占了多数，更加强了政府对付“亚洲第一”派的力量。那年年底发生了美国在华战俘问题的危机，但是美国对此的反应并不强烈：参议员诺兰提出的封锁中国的建议绝无通过的可能。甚至在12月份同中国国民党人签订的协定，与其说是给予鼓励，倒不如说是限制了蒋介石的任何冒险行径。确实可以说美国这一年对中苏两国的外交政策陷入了困境和“长期拖延”。

法国曾是印度支那危机的中心之一，在这一年里也是其他错综复杂的主要外交活动的焦点，它是以最终拒绝欧洲防务集团开始而以成立西欧联盟告终的。孟戴斯-弗朗斯先生的个性和政策决定了欧洲和远东事态的进程。他曾许诺在一个月内安定印度支那局势，从而上台执政，随后又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八个月后在他下台时，北非另一个殖民地又发生了危机。他在短短的任期内，草率地结束了长期来使法国政策陷于瘫痪的犹豫不决的苦恼状态，最后还是以送葬者而不是杀人犯的身分解决了欧洲防务集团。从6月到12月，这件事的谈判构成了当年外交史的重要部分，尽管其结果也许不如当时看来那么重要和有希望。生不逢辰的欧洲防务集团一直气息奄奄，欧洲概念的大部分神秘性也就在它的病榻旁的无边无际的争吵声中丧失殆尽了。这一问题的结果是降低到要为德国在西方阵营内重整军备觅取能为法国接受的措辞。措辞是找到了，可是欧洲防务集团的主要职能——严密控制德国武装力量的复活——却丧失了。新的安排对欧洲的统一并未作出任何贡献，而加强把德国

5 维系在西方阵营内的程度也是值得怀疑的。法德两国之间的关系由此更恶化了。联邦欧洲的概念已经所余无几，只剩下某些经济安排还能给它一些生命力。

欧洲防务集团——西欧联盟的危机所涉及的虽然是关于重新武装德国并使它结合在西方阵营内，可是行动的核心首先是法国，其次是英国，而不是德国。如果说法国最早的计划是想在欧洲防务集团内与德国秘密交易，那么它最后却无力把它付诸实施，这是它放弃这个计划的决定性因素。英国愿意履行它在欧洲大陆上的责任（谈不到增加责任），则是西欧联盟得以成立的决定性因素。

英国的政策较之它最近多年来采取的确属更为重要，首先是它作为一种阻力，制止了美国在印度支那承担责任，其次又作为一种润滑剂，推动了西欧联盟的工作。由于种种原因，1954年的美国外交政策和美国在海外的形象是很不走运的一年。这一年美国又发生了奥本海默案，以及欧洲头条新闻刊载的参议员麦卡锡压倒一切的突出地位（尽管也有因与军方失和而下台的新闻）。还有“大规模报复”战略、威胁干涉印度支那、美国在日内瓦会议上的态度以及它对金门、马祖的态度、氢弹试验的不幸事件、同中国国民党人签订的协定、对巴基斯坦的军事援助、马尼拉条约和危地马拉事件等等^①，凡此种种都使欧亚各方面的重要舆论感到惊慌和不信任。

如果西欧联盟的重要性是在日益减退的话，那么1954年在中东发生的事件更是如此，而且不仅是对英国，就是对总的国际形势来说也是这样。英国在那年作出的最不容易推翻的、最严峻的决定就是同意放弃苏伊士。对英国和埃及来说，这是七十年历史的结束，是使埃及政局的形成和使现政府掌权的那种关

^① 本卷未涉及拉丁美洲。1954年的危地马拉事件可见《概览，1953年》。

系的结束。对英国来说,这种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不但因为在这个超级大陆国家的新时代里,以及在防务优势的新模式里,它的力量有限,而且还因为它的主要利益也有了变化。在本世纪开始之前,中东是英国去印度的主要通道,而在最近五十年里,它又是主要的石油来源。如果说去印度的通道已经不再具有重要性,那未免讲得过分,但是英国在中东的利益确实不象以前那么至关重要了。就石油产地而论,苏伊士并不是保卫产油区的良好基地,不值得冒触怒埃及人的风险去保持它, 6 尽管西欧经济愈来愈依靠运河所起的作用,因为通过运河转运石油在经济上的重要性是大的,而且还在日益增长。

如果英国人有充分和必要的理由撤走的话,它留下的可能不是权力真空,而是在这一地区留下一块各显神通的活动空间。这一活动空间由于当地政治上的新区域性安排的冲击而扩大了(这一安排在1954年称之为“北层”联盟,1955年则具体化为巴格达条约)。巴格达条约可以用“折衷”一词去解释,它一方面承认高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可以使旧的双边条约(如与伊拉克和约旦等所订的条约)夭折,另一方面又仍然希望由他们提供一种不那么伤害阿拉伯人感情的新形式去保持他们的战略利益。巴格达条约同阿拉伯联盟有些相似之处,因为英国希望凭藉支撑中东防务以抵抗某个大国的外来侵略,同时又对强烈的阿拉伯感情作些让步。但它又和阿拉伯联盟不同,因为它不是以埃及为基础,这是由于纳赛尔上校出于他持之有理的原因而加以拒绝了。英国当然有强有力的理由在未得埃及同意的情况下推行它的安排,但在此过程中使阿拉伯联盟分裂,因而在下一年中给俄国在中东打进了外交上的楔子,而埃及也因此发现了长期来为波斯所使用的外交策略。中东强权政治的三角游戏历来是在英、法、俄三国之间进行的,俄国在1917年垮台之后,这个游

戏有了改变，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法国也被挤出去时，它已告结束；但是现在又找到四个接班人来参加游戏了：美国挤了进来，英国手中的王牌比以前少了，苏联正竭力改进沙皇俄国曾使用过的方法，而以纳赛尔上校为代表的满腔仇恨的新的民族主义成了第四方。

对西方各国来说，埃及确已逐渐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中东国家，正如印度对它们是一个重要的南亚国家一样。尽管它的军事力量并不很强，但还是有很多因素使人对它更难掉以轻心：它的地处亚洲、非洲和地中海交叉路口的战略位置，它确实实际控制着苏伊士运河和英国的基地设施，它的革命指导委员会的革命民族主义的号召将会在其他阿拉伯国家产生相同的力量，泛阿拉伯的感情正在增长，而埃及作为阿拉伯世界的文化领袖，自然也会赞助这种感情。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埃及革命后的典型性的外交政策的冲击已为整个阿拉伯世界所感觉到，从大西洋到波斯湾，一直到达非洲的穆斯林地区。

7 1954年是欧洲优势下降的一年：印度支那，苏伊士，阿尔及利亚，埃及的固执和中国的崛起，这些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国家从非欧洲世界逐步撤退的里程碑，同时也使冷战突出地成为战后最重要的历史现象。中立国家的日趋重要是这一发展的有趣的支流。不应该说作为一种政治感情的中立主义仅局限于前殖民地国家，而应该说由于各种情况的综合作用，使南亚的一些前殖民地国家，特别是印度，获得了在国际上运用策略的自由，因而增加了它们的政策在外交上的影响。这些不结盟的亚洲国家（还有英帝国和法帝国内若干正在进行交涉以获得独立的领土也可指望参加进去）在世界性的辩论中成了不固定的选票。西方的自尊心在与亚洲的交往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所以特别对西方来说，它所看到的反映在不结盟的亚洲人心

目中的西方社会形象是很重要的，而且不总是令人安心的。

本年年底，中立主义和反殖民主义联合起来为万隆的亚非会议作了准备。在这一组合中，还发现存在着另一种感情。反殖民主义可能是受到了摆脱被保护和依附地位的刺激而并非出自种族感情，然而因为前统治者是欧洲国家，而被保护国都是非欧洲国家，因此在这场斗争中不可避免地涉及了种族仇恨，而且来势颇为猛烈。这种感情一旦转移到国际方面，在欧洲（就种族意识而言）和非欧洲世界之间便展示出紧张的阴影，以致到将近年终时，在现代外交史中出现了一种崭新的现象：没有欧洲人出席的会议。

以上所谈各事是本年外交史的主要内容，也可以说是在外交舞台上的表演。本卷对其发展所作的叙述则可比作戏剧背景的变换。这是军事技术的演变，并且与可能产生重大政治后果的核武器的发展有关。武力是外交的最终支持，它们之间的结合就是相互补充。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决定它需要什么样的武力，而武力也可以部分地决定这个国家能具备什么样的外交政策。因此任何时代的外交集团都应 与当时占主流地位的战略概念相符合。这些战略概念的改变一般十分迟缓，但有时也会那么急剧地转变，以致人们会看到一种特殊的外交安排，几乎同时 8 是以旧战略与新战略为其背景的。1954年的苏伊士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由于出现了新的、可怕的热核战争前景，基地及其与埃及的关系遂失去了一部分旧的意义。

当时自然无法充分估价这一战略革命造成的错综复杂的政局。“战略革命”这一用语本身在使用上就有很多保留，这是因为其中包含着不少未知数和半未知数，而且因为同样的说法曾被一再引用而证明是误用的。然而关于政治目的和军事手段之间的关系，即使从这种新武器上引出的结论不一定正确，但是能引